共识思想者联盟——会员2.0版招募进行中 让思想更有尊严 让共识成为可能
共識網 21ccom.net
用户名： 密码： 验证码： 登录

郑永年：中国为什么没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？

2016-06-18 08:47:14
来源：IPP评论 作者：郑永年

我要评论 点击：7409次

摘要

一旦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时，思想就不再是思想;一旦思维被控制时，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，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，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的能力。这里的逻辑就是：国家越富有，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，思想就越贫乏，文明就越衰落。这是中国的现状。

*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(微信ID：IPP-REVIEW)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，原文摘自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之《通往大国之路》

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，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。从内部来看，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，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法解释自己的社会，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，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，或者自己的社会科学，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，结果往往是曲解。也很自然，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。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，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，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。

就外部世界来说，随着中国的崛起，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。其中，对中国的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。从前，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。但现在搞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，中国已经相当开放。当然，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，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。**透明度越高，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。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。**

但是，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。**现实的情况是，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“软空间”非常狭小，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(如经济力量)毫不相称。**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这些年来，在很多方面下手，狠抓中国的“软力量”建设。

孔子学院和媒体“走出去”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。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，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。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。不过，情况不容客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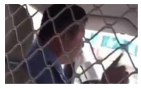
从总体上看，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，反而是在越来越深。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“走出去”，都具有工具性，即中国所说的“外宣”。不过，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，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的。

“外宣”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。当然，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。**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，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“对外宣传什么”的问题，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。如同内部统治，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“软空间”继续收缩，那么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。**

新媒体专区 APP

资本主义精神的三个代表 | 共识A

慈禧的手机没有充电器 | 共识APP


最可怕的是“正义的化身”可能不真的认错 | 共识APP

龙应台：中国知识分子的“文化沙文主义” | 共识A

微信 微博 会员 投稿

排行榜

三天 七天 一月

- 于幼军首课：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
- 李克军：应尽快启动县政综合改革
- 何帆：有人宣布改革成功，众人为何嗤之以鼻
- 财政部刘尚希：部委忙于发文件，难落地
- 雾满拦江：制度是国家的良知，规则是群...
- 郑振清 ：台湾民主将亡于蔡英文时代？
- 安志文：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
- 温铁军：中国若完成“三个差别”再平衡
- 清华院长王名：拱卫统治还是改革体制
- 光谷客：武钢减员5万人背后 一个普通

什么原因导致了思维的“被殖民”

“软空间”缺失的因素有很多，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。中国有古老的文明，有当代的最优实践，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。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。

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、解释自己。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，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。**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：经济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，社会学家意识到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，政治学者发现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。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?**

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，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、西方社会学家、西方政治学家，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。结果呢?大家越说越糊涂，越解释越不清楚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，搞知识层面的“自主创新”。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，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。
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?简单地说，这是一种思维、思想“被殖民”的状态。从“五四运动”以来，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。进入近代以来，旧中国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国家所打败。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，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，即所谓的向“西方寻求真理”。西方就是真理，就是科学，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。学习西方，便是政治上的正确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，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，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。

总体上说，自由派学欧美，左派学苏俄。很显然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，都是西方的产物。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，也有类似于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”的思想意识运动，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，而不是中国。视西方为真理，为科学，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“非真理”、“非科学”了。长期以来，知识界那些追求“非西方”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“不正确”。

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无论左右派，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。左派主张公平正义，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。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对立，都是从西方进口，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。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，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，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。

所不同的是，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，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，这样就可以永无止境地“妖魔化”其它一些价值，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。

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，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，而不是基于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。很多人像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，非常满足于思维、思想被殖民的状态，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。真理在手，就高人一等。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。[page]

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

但在中国，知识分子人人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，都想改造世界。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。结果呢?越改造，这个世界就越糟糕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，决策者要负责，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很大的一份责任。

一个文明，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，就不可能变得强大。自近代以来，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。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。正因为如此，其有能力解释自身，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。实践是开放的，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，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。在国际舞台上，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。

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。社会科学中的“西方中心论”成为必然。“西方中心论”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，其本身并没有错。当人们说“社会科学”时，这里的主体是社会，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。

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。然后，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。意识形态、文化、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。

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，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。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，而不是他人的责任。不过，很显然，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“被殖民”的状态下，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。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，首先要意识到“被殖民”这一点，然后，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。

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，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。很显然，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，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。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。更重要的是，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，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。

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，中国可以应用西方体系，但不会创新。一个严酷的现实是，一旦涉及创新，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、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。抄袭知识、复制知识，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。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。实际上，知识和知识的实践(制造业)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，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。

要摆脱思想“被殖民”的关键是政治

“被殖民”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，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。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。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，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。秦朝统一中国之前，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，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。但是，秦朝统一中国之后，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。

数千年里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，或者当王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，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。而在近代“向西方寻求真理”以来，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，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。无论是哪一种依附，本质是一样的，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。

而对统治者来说，相比之下，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。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，尽管保守，但为社会所接受，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。而后者呢，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，既不能解释现实，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，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。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。

很显然，要创造知识体系，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，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。作为当政者，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。当然，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。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。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，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，必须加以规制。

只有规制，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。传统社会，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，意识形态的控制(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)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。但是，在现代社会，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，就没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。

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也必然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，也就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机制上。尤其是知识生产领域，即教育和科研领域。**就是说，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，而是控制。**举例来说，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，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，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，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做思考、做研究，这样才会有创新。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，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，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。

为了生存，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(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)申请资金。实际上，即使申请到了基金，他们也要为生活着想，想着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转化成为自己个人的消费。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，而是为了控制。

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，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，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。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，这明明是控制机制。对掌管金钱者而言，你要向我申请资金，你就必须听我的，我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你越听话，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。当然，你越听话，表明控制就越有效。

这种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。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，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。例如，在这一体制下，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，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，只需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，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，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。

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，研究者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“研究成果”。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“外国技术、中国原料”的生产过程。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、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。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，谁也别想改变这个体制，中国也永远别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。

一旦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时，思想就不再是思想;一旦思维被控制时，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，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，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的能力。这里的逻辑就是：国家越富有，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，思想就越贫乏，文明就越衰落。这是中国的现状。

今天，在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，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?现实是，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，那么创新便是空谈，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。

责任编辑：花满楼

点赞86

声明：凡注明来源"共识网"文章的，转载请注明出处、作者、原文链接。本网站作为互联网言论交流平台，所刊发文章并不代表本站立场。

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
21ccom.net

共识app，让思想更有尊严

微信 ios android

参与评论

登录

来说两句吧...

畅言 CHANGYAN

畅言一下

还没有评论，快来抢沙发吧！

Copyright © 2009-2016 共识网版权所有 | 网站统计 | 京ICP证100799号 | 京ICP备12007618号-2 | 京公网安备110105004507号